

把握整体: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哲学考量

蒋巧红,陈晓燕,章 诚,方彬彬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推进与“全球南方”崛起的时代背景下,针对当前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存在的碎片化等瓶颈,亟需以大历史观为统摄,深入阐释其整体性建构的哲学基石,并尝试性提出“三维协同”建构路径:理论自觉,在大历史观中锚定整体性认同;实践自主,在社会互动中实现整体性创新;文明自为,在全球对话中贡献整体性智慧,以期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从局部描述走向整体建构的范式跃升,为深化当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大历史观;中华文化主体性;整体性建构;困境;哲学框架;路径

[作者简介]蒋巧红(1986—),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陈晓燕(1985—),女,安徽滁州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政教育。章诚(1994—),女,安徽芜湖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政教育。方彬彬(1996—),女,安徽淮南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政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质量工程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24sxzzjy003);安徽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4SZX003);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25KYR13)。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3013>

[中图分类号] B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在此时代背景下,中华文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持久而深厚的智慧与动力。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研究趋于零散,多聚焦于特定历史断面或文化门类。为突破研究困境,亟需以大历史观为统摄。

一、问题意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四重困境

(一)知识生产的碎片化

当前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大量研究成果集中于个案式、截面式分析,呈现出“点式繁荣”而“面式薄弱”的现状。这些研究固然在各自领域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这导致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理解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识论困境。这种知识生产的碎片化,使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长期停留在“局部描述”层面,难以实现向

“整体建构”的理论跃升。

(二)学科分工的孤岛化

学科分工的日益精细化为学术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也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领域造成了严重的“孤岛化”效应。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政治学等学科各守疆域,以各自独特的学科范式、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彼此之间跨学科对话机制严重薄弱。这种学科孤岛化格局,与中华文化主体性本身所具有的贯通性、整体性特质形成尖锐矛盾,成为制约研究深化的结构性障碍。

(三)理论资源的内外区隔

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在理论资源的运用上,长期面临“内”与“外”的区隔困境。在运用内部资源时,试图从中华文化内部阐释框架与分析方法,研究流于自我重复,难以形成具有广泛对话能力的学术话语。在运用外部资源时,借鉴西方的研究理论存在“概念套用”的风险,往往因理论框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文化间距”而显得生硬牵强。这种内外区隔,易造成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陷入“以中释中”

和“借用他者言说自己”的困境。

上述三重困境,将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困于“局部描述”的层面,共同制约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的深化。突破这一困境,亟需寻求一种能够统摄全局的方法论视野,使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实现从“局部描述”到“整体建构”的范式跃升。大历史观为此提供了可能的方法论路径。

二、理论基石:“自觉—自主—自为”的整体性哲学框架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阐明了文化主体性并非静止的特质,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过程中逐步生成,并展现出能动性与创造性的文化存在方式。因此,将其置于大历史观的视野下审视,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了“自觉—自主—自为”的整体性哲学框架。

(一)文化自觉性: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性认知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对文化主体性进行理性反思。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性”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历史自觉。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人类在“轴心时代”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觉醒,各大文明都形成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根本性反思。这种历史自觉是文化主体性的时间根基。第二,结构自觉。研究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要把握中华文化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价值体系,这包括对核心价值观念、基本思维方式、审美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理性认知。第三,关系自觉。文化主体需要在与他者文化的比较中认识自身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批判了西方对东方的本质化建构,真正的文化自觉必须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既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也要避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以上三个表现,正是为了突破“知识生产的碎片化”。

(二)文化自主性:对外来文化元素的批判吸收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3年6月2日,他又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命题。上述重要论述,强调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文化的自主性认知。文化自主性包含三个

关键要素:第一,价值判断的自主性。在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文化主体必须有能力对各种文化价值进行独立的评判和选择。第二,发展道路的自主性。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是在充分自觉基础上的自主选择,既要吸收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第三,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立自主的文化话语体系,意味着掌握文化解释权、价值定义权和叙事主导权。当前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在中国实践基础上提炼中国理论,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道路。上述三要素,直接回应了“理论资源的内外区隔”困境。

(三)文化自为性: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

文化自为性是文化主体性演进的高级阶段,标志着文化发展在自觉和自主的基础上,迈向主动的、有目的的“创造”。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要与时代契合,就必须通过创造性阐释和实践性激活,使传统价值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第二,文化体系的创新性发展。这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艺术创新等多个层面。这需要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对话中,构建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普遍意义的新文化体系。第三,文明形态的贡献性构建。文化自为性的最终目标是创造能够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的新文化形态。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指出,中华文明可能为陷入困境的西方文明提供新的出路。上述三个层面,为超越“学科分工的孤岛化”提供了价值指引。

(四)“认知—选择—创造”的整体性演进机制

“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三者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其内在逻辑体现为“认知—选择—创造”的整体性演进机制。首先,自觉性是自主性的认知前提。没有深刻的文化自觉,文化选择就会陷入盲目性。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描述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意识必须经过“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等阶段,才能达到自我认识。其次,自主性是自为性的实践保障。缺乏文化自主性的“创新”,往往沦为对他者的模仿或依附。最后,自为性是自觉性与自主性的价值实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文化自为正是这种自由自觉活动的最高体现。由此观之,“自觉—自主—自为”这一哲学框架,其理论力量不仅在于它对文化主体性内在逻辑的深刻揭示,更在于它为破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三重困境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武器,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实现从“局部描述”到

“整体建构”的范式跃升,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实践路径:“理论自觉—实践自主—文明自为”三维协同的整体性建构

在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整体性建构并非单一维度的线性推进,而是“理论自觉—实践自主—文明自为”三个维度协同推进的整体性工程。

(一)理论自觉:在大历史观中锚定整体性认同

为突破“知识生产的碎片化”在“认知”层面的根本困境,“理论自觉”正是在大历史观的统摄下,重建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整体性认知,即在大历史观中锚定整体性认同。

首先,在文化生命体的建构逻辑上,摒弃“反传统”“去传统”的现代化误区,以大历史观审视文明延续性,在继承中发掘传统的现代性力量。厘清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这种实践活动,为确立稳固而清晰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历史支撑。其次,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认知,必须深入到其内部丰富多元的构成肌理之中,揭示其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复杂结构。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各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共生互动机制。只有深刻把握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形成整体性认同。再次,中华文化的自觉,不仅需要内向深度发掘,向内扎得越深,向外看得越清,也需要外向广度比较,在参照中更清晰地认识自我的独特面貌。这种比较的意义,绝不仅在于阐明自身的特殊性以固守边界,更在于在全球文明对话的舞台上,确立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文明沟通对话的理性定位。为此,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向国门,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

(二)实践自主:在社会互动中实现整体性创新

为突破“学科分工的孤岛化”与“理论资源的内外区隔”在“选择”层面的深层障碍,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不能只停留于认知层面,更需要有针对性地做出回应,即在开放的社会互动中实现整体性创新。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自信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道路自信为文

化自主提供了实践根基,从而为文化自主性在当代社会的落地提供了整体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实践路径。其次,文化创新活力的持续迸发,离不开专业精英的深度耕耘与普罗大众的广泛参与之间良性的双向互动与共振共生。采用精英的深度与大众的广度相结合的模式,使得文化创新既有学术的厚重与艺术的高度,又有生活的温度与传播的广度,上下贯通、生生不息,成为文化生命力在当代社会蓬勃生长的重要源泉。再次,文化自主的实践场域,正在从现实世界加速扩展到数字空间,并走向二者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这种现实世界与数字空间的深度融合,不仅以新的方式保护了优秀的文化遗产,更从根本上创新了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形态,为文化自主性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开辟了崭新疆域。

(三)文明自为:在全球对话中贡献整体性智慧

哲学框架中的“文化自为性”指向的是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在实践层面,“文明自为”的任务是将“文化自为性”的创新发展能力转化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性贡献。这不仅突破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的三重困境,更是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具有东方智慧核心理念,其当代意义在于能否被系统性地激活、创造性转化并升华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框架,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有别于西方范式的新思路。在“全球南方”集体崛起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如何超越差异、和谐共生提供了新的理念框架与行动指南。这实质上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想象,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模式,为构建一个多极、多元、平等、包容的世界文明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当人类共同迈向科技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伦理边界与人存在方式的前沿领域时,中华文化自为性的一个高级表现,是能为全球性未来议题提供前瞻性的伦理框架与思考路径。这种贡献使中华文明成为塑造人类共同命运、探索文明新形态的积极参与者和智慧提供者,凸显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世界意义。

四、结论

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为审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超越一时一域的整体性框架。“理论自觉—实践自主—文明自为”三维协同实践路径,正是在大历史观视域下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进行哲学考量的回应。它超越了对具体文化问题的零

散修补,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体系化思维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化领域,实现了从“问题—对策”的经验模式向“历史叙事—理论框架—实践路径”三位一体的范式跃升。这一路径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的方法论体现,也标志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研究从局部描述走向整体建构的学理突破,从而为深化当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4-10-25(1).
- [2] 张西平. 从大历史观理解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24):14-2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4] 费孝通. 文化与文化自觉[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
- [5] 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李夏菲,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8-14.
- [6]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9.
- [7] 习近平.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2022-4-26(1).
- [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2.
- [9] 罗素. 中国问题[M]. 秦悦,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90-196.
- [10]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59-139.
- [1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5.
- [12] 史敏,鲁梦. 大历史观视域下“第二个结合”的主体性向度[J]. 甘肃理论学刊,2025(5):47-55.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外文出版社,2025:296-297.
- [14] 唐莉,范兆飞.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J]. 特区实践与理论,2025(2):93-100.

Grasping the Whole: 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nd History

JIANG Qiao-hong, CHEN Xiao-yan, ZHANG Cheng, FANG Bin-bi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given the existing bottlenecks such as fragmentation in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it is urgent to adopt the Grand History perspective as a guiding framework. This approach aims to deeply elucidate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its holistic construction and tentatively propose a “three-dimensional synergy” construction path, namely: theoretical self-awareness—anchoring holistic identification within the Grand History perspective; practical autonomy—achieving holistic innovation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ivilizational self-assertiveness—contributing holistic wisdom through global dialogue. The goal is to realize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from fragmented description to holistic construction, thereby providing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system and mechanisms.

Key words: Grand History perspective;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holistic construction; dilemmas;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approaches